

谈谈北京话

李 永 寧

Muse on the language of Peking

Lee y. n.

前言

插头、插座有扁头、圆头，还有三叉头等，用起家电，很不方便。语言是个文化的集中表现。精神，意识的“输入”、“输出”都靠“语言”这个媒介。在日常生活上，往往碰到“鸡同鸭讲”的尴尬局面，实在不好办。广土众民的中国，这哪能行？先让我们别提“对人类要有较大贡献”这种豪言壮语，连个自我生存都会很难保障。这是严峻的现实。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碰到了很多困难，困难之一是研究的依据都是书面语，而现代汉语书面语却严重不纯，很不规范，夹杂着各种方言成分，古汉语成分，还有各种欧化语法成分。要从如法驳杂的对象中整理出条理来，是难上加难，而且即使整理出一些条理来，任何人都可以随手拣起不少‘例外’来加以非难。因此，长期以来我总想选择一种比较单纯的对象来分析研究，最后选中了北京话。相对而言，北京话是比较单纯的，特别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北京话的口语形式，尽管不可能象化学元素那么纯，个人差异也是很明显的，不过和现代汉语的书面语相比，也可以说是相当纯了”（《北京话初探》）。我很同意胡明扬先生的想法，也是我决心写出小文的动机。

北京话做为一种地区方言，有其特殊地位和特殊价值，因此对北京话的研究本身就很有意义。对北京话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对现代汉语的研究。

我曾攻读过英文，懂得跟北京话相距不少的中国另一种重要方言——广州话，对日文，我自己认为相当熟悉。这对我研究普通话的孪生兄弟——北京话，有了不少帮助。

要研究北京话，就得在活生生的北京话的，汪洋大海中寻找根据，可惜一个人的能力和精力必竟有限，未免事倍功半，并且还免不了有失误。因此，为写这篇文章，我曾反复参阅了胡明扬先生所著的《北京话

初探》和老舍的《茶馆》，《骆驼祥子》。这样，我相信可以避免过于主观。

我深知我自己的能力很有限，写出的文章就很浮浅，望得到读者和同行的指正与教导。

1. 北京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闻名世界的古城。它有悠久的历史，光荣的传统，丰富的古迹，幽美的园林，著名的历史人物，灿烂的文化遗产。北京从一个原始聚落，逐步成为北方重镇，以至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以及文化中心，经历了漫长的道路。

北京位于华北平原的北端，东濒大海，西，北和东北三面有群山环抱，成为天然屏障。正是“左环论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把成国时秦，赵，燕分别修筑的北长城并延展为万里长城。北京既有优越的地现形势，又有长城拱卫于北面，这是它成为北方重镇的重要条件。

约五十万年前，在北京周口店，居住着在考古学上被命名为“北京人”的原始人群。他们长得既象猿又象人，所以也称为“北京猿人”。这些“北京人”，为了获得必要的食物和抵御猛兽的侵袭，自然地结合成群，过着原始的群居生活。约一万八千年前，周口店龙骨山的洞里，居住着“山顶洞人”的北京先民。他们的体质特征跟现代人已没有什么区别，智力也相当发达，会用骨针和骨锥缝制衣服，围上兽皮做为裙子。他们还懂得爱美，例如把钻了孔的鱼骨兽牙等用皮条穿成项链，用红色的赤铁矿粉涂在装饰品上，使它显得鲜艳美丽。到了四五千年前，出现了经营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的聚落。这时北京地区的先民，已经从原始状态跨入了文明时代的门槛。神话传说也有助于了解北京的远古史。相传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黄帝，曾在“涿鹿（今北京官厅水库附近）之战”和“阪泉（涿鹿东南）之成”中，先后战胜了蚩尤和炎帝，还在涿鹿建立了都邑。黄帝的孙子颛顼，曾到幽州祭祀，幽州就

是北京早期名称。总之，“北京人”及其后代，是形成古代中原民族的最早的族源；北京地区是中国远古祖先的故乡和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之一。秦始皇时代，北京叫蓟城，唐朝称幽州，金（1115—1227）名为中都，元朝叫大都，明朝始称北京。清朝也叫北京，国民党政权建立后改为北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叫北京。北京做为一个地名，所指范围可大可小。最大的范围是北京市地区，包括十个区，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宣武区，朝阳区，海淀区，石景山区，门头沟区，丰台区，燕山区。不过，拿北京人说，对石景山区以下的区，总觉得很遥远的地方啦。老北京指的“北京”，好像就只指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四区而已。在清代和新中国成立以前，“达官贵人”大多住在东城和西城，其他都是商人或手艺人，闯江湖的艺人，穷苦的劳动人民居住的地区。

2. 北京人

最早的“北京人”就是“北京猿人”（！）。商代（约前二十一世纪—约前十六世纪）北京地区已有汉人的祖先定居。估计当时的人口是很稀少的，集中在一些有防御工事的居民点中，周围是游牧的少数民族。秦汉以后这里是北方的军事重镇，居民中相当数量的人是军人，并且汉人和少数民族一再交替控制这一地区，居民成分变化很大，很难形成稳定的传统。元代的大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都会。大都（北京）取代了长安，洛阳，开封等古都的地位，成为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地理位置，不仅利于统驭全国，也更利于吸取先进的中原文化。元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封建大帝国，对外交往来有了空前的发展。外国的使节，商人，传教士，科学家和医生等，成批地来到大都。元政府在大都设有接待少数民族官员和外国使节的会同馆。那里经常住有来自高丽，日本，安南，缅甸，以及中亚和欧洲等地的远方客人。大都是元代文学最高成就元杂剧成长的摇篮。大剧作家关汉卿和《西厢记》的王实甫都是“北京人”。在今安定门内国子监街的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建于1306年。入学的监生有蒙，回，汉，女真等

的学子，我估计不少是“北京人”。大都（北京）是个多民族的大城市，其中汉人有多少，占多大的比例，现在已不可能正确统计。根据当时的史料和元杂剧的描写，汉人占多数是很可能的。明代“北京人”肯定是汉人占绝大多数，原有的蒙古族居民大多数已随元皇室人员北撤，其他少数民族居民后来逐渐和汉族同化。一到清朝，原有的北京居民大部分外逃，内城居民全部迁到外城，今天的东西两城只准满族八旗王公大人和后来的汉族高级官员居住，居民成分变化极大。元明交替，明清交替，因为统治大权在不同民族之间易手，“北京人”成分都会有很大变化，这种社会变革不可能不对北京话的演变留下痕迹。一个地区的语言变化是和居民成分的变化分不开的。今年夏天7月份，我从我以前任教过的大学骑车穿过北新桥（旧称“王大人胡同”），碰到相识30年的老北京人老高。在路上寒暄一阵之后，八十多岁的老者问：“您现在住哪儿呢？”我回答：“朝阳区，和平里再往北！”他惊叹道：“哎哟，那么远哪！”在“老北京”心目中，北京就是指东城，西城，崇文，宣武，朝阳、海淀等就离“北京”的很“僻角心”的地方儿啦。住在这些地方的人，不是“北京人”而是“海淀人”etc.

“北京人”指的是在北京出生和长大的人，“外地人”指的是在外地出生和长大的人。“外地人”的情况很复杂，有北方人，有南方人，有北京话讲得很好的，有在北京住了几十年而还是一口家乡活的。还有，“外地人”有时候要按籍贯进行分类。“北京人”还可以分为“老北京人”和“新北京人”两类。“老北京人”指的是父母双方是北京人，本人在北京出生和长大的人。就北京的具体情况而言，追溯到父母一辈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再往上追溯，因为在解放前北京的人口成分还是比较稳定的，北京话的变化也不太大。“新北京人”，指的是父母双方或一方不是北京人，但是本人在北京出生和长大的人。“新北京人”的情况比较复杂，可以根据父母的籍贯进行再分类，如果父母双方籍贯不同，根据母方的籍贯进行再分类，因为子女在语言习惯的形成过程中一般受母亲的影响比较大。

3. 北京话

谈谈北京话

北京话是北京人讲的话。老北京话是老北京人讲的北京话，新北京话是新北京人说的北京话，但是具体到每一个北京人，有的老北京人，特别是年轻人，有可能说的不是老北京话而是新北京话。另一方面，有的新北京人，特别是老年人，有可能说的是老北京话而不是新北京话。这些都由每个北京人所处的语言环境所决定。老北京话和新北京话的区别主要在于老北京话保留更多的地方特色，保留更多的土话土音，而新北京话则更接近普通话，较少土话土音。北京话从总的来说比其他方言更接近普通话，但是北京话不等于普通话，北京话是北京土话，和其他方言一样是一种方言。北京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因此北京话存在明显的内部差异。就目前来说，老北京话和新北京话就是北京话的两种主要的不同的变体。北京话的渊源，或北京话的发展史，是一个饶有兴趣但又难度相当大的研究课题。第一个“北京人”的北京猿人的嗷嗷叫声，也算“北京话”吗？元代关汉卿和王实甫讲的是什么样的北京话？明永乐帝讲的是什么样的北京话？清代曹雪芹讲的，又是什么样的北京话？元，明，清三代的北京话和今天的北京话有什么不同？在历史上官话和北京话究竟是什么关系？元代的蒙古族和清代的满族对北京话有过什么样的影响？这一类问题还有很多，都需要花功夫去研究探索。由于北京话的特殊地位，对北京话发展史的研究成果将会成为汉语发展史的重要内容。至于对现代北京话的研究则更有其现实意义，并且也是现代汉语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完全不同于对一般方言的研究。

4. 普通话

汉语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由于山川阻隔和封闭的社会生活，方言十分复杂。概括地说，可分7个大方言。1. 北方话方言。又称官话方言，是现代汉语的基础方言。分布在东北，华北，西北，西南以及华东长江以北和长江南岸镇江以上九江以下的沿江地区，湖北大部分（除东南角），湖南西北部，广西北部，北方话地区占汉语地区的四分之三，使用人口占汉族总人口的70%以上。（北方话又可分为北方，西北，西南，江淮四个次方言）。2.

吴方言：分布在江苏江南和浙江绝大部分地区。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的8.4%。3. 湘方言：分布在湖南大部分地区。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的5%。4. 赣方言：分布在江西中部和北部地区，湖南东部，湖北东南角和福建西北角一小部分地区。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的2.4%。5. 客家方言：分布在广东东部，北部，江西南部 and 福建西部，以及广西，台湾和四川局部地区。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的4%。6. 闽方言：分布跨越四省，包括福建省大部分地区，广东潮汕地区，海南岛和雷州半岛部分地区。浙江南部温州地区一部分地区，台湾省的大多数汉人居住区。此外散居在南洋群岛中的好几百万华裔也都祖祖辈辈以闽方言为自己的“母语”。使用人口占汉族总人口的4.2%。7. 粤方言：以广州话为代表。分布在广东中部，西南部和广西的东部，南部等的一百来个县。它也是香港，澳门同胞海外华侨的主要交际工具。使用人口占汉族总人口的5%左右。就与普通话的差别来说，上述大方言中，闽、粤方言与普通话的距离最大。*各方言间最主要的区别是语音差异。例如“日本”一词，普通话读“日本”(rì běn)，东北人读出来像“一本”潮州人读出来“ニッポン(nippon)”和日语一样。“猪肝”一词，普通语音(zhū gān)，而江西人念出来像“巨罐”。普通话“石头”江西人念像(shā tóu)，就是说，普通话(我要石头)，江西人说成(我要杀头)啦。这种语音差导常常使不同方言区的人在交谈中急得面红耳赤，却互不知所云。除了语音相差甚远外，各方言之间表达同一事物所用的词汇也不尽一致。普通话缝纫机广州话叫“衣车”。缝纫有一道工序叫做“锁边”，就是用线把布料裁剪过的一边包上，广州人把它称为“钹骨”。又如“下雨”，广州话说“落雨”。普通话“下飞机”“下车”，广州人说成“落机”“落车”。语言不一样，词汇再有别，就更让人难解了。然而差别还不仅在上述两方面，还包括语法方面的。例如普通话讲“你先走”，副词在动词前面。让广州人一说，就成了“你行先”，副词跑到动词后面去了。这种状况，是与中国这么大的国家的教育工作和经济工作的需要极不适应的，也不适应国家统一，人民团结的要求。在大多数国家，实现民族共同语的统一，基本都以国家政

*参阅《现代汉语》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5年 4页

权的统一和生产及交通运输的发展以及教育的普及为背景。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共有56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94%左右。国家实行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的政策。在国际活动中，汉语是代表中国的法定语言，过去叫“国语”。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强调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的政策，为了避免“国语”这个名称引起国内少数民族的误解，所以在一九五五年十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期间，经过研究讨论，决定将规范的现代汉语（同时也是中国民族间的族际共通语）定名为“普通话”，并确定了普通话的定义和标准，这就是“以北京语言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现代汉语”。*一九五六年二月六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指示中把普通话的定义和标准作了增补，成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

普通话的标准。1. 语音标准。中国古代早就存在方言分歧，但是书面语却是比较统一的，这种书面语是以北方话为基础的。因为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在北方的中原地区，宋朝以前历代的都城大多没在西安，洛阳或开封。所以中国很早就以北方中原地区的方言作为共同的基础。然而北方话是地区方言，地区方言内部的语音，也是不统一的，无法做为标准音，因此只有北方地区里的某一个地点方言才有条件做为标准音。例如北方地区方言有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等很多不同地点方言，民国初年的国语运动就确定其中的北京音为标准音。确定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十二世纪起，金、元、明、清各个朝代都以北京为京都。八百多年来，北京一直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这样，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官话”，随着政治力量和白话文学传播到各地。几百年来，这种“官话”在人民中间扎下了根。辛亥革命以后，叫做“国语”。“官话”和“国语”是一脉相承的，它们基本上都以北京语音为标准。多少年来，北京语音通过学校，广播，话剧，电影等多种渠道为传播。所以，确定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有准音，容易被广大群众接受。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指的是北京语音系统，并不

*《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1995 当代中国出版社 277页

是指北京土音，如北京土音的，“我们”说 mmen，“这么”说 zème，“豆腐”说 dòu fe，“逮”说 dēi，“朽”说 qiǔ，“熟”说 shóu，“学”说 xiáo。也不是指北京人所说的每一个字的读音，如北京人把“教室”读成 jiào shǐ，把“质量”读成 zhì liàng，而普通话标准音定为 jiāo shì, zhiliang。2. 词汇标准。普通话定义里“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这里指的主要是词汇。也就是说，普通话词汇主要来源于北方话。当然不能把所有北言话的词都看做是普通话的词汇，要有一个选择。经过选择以后，才成为普通话词汇。例如“我”为“俺”，就不是普通话词汇。又如“玉米”，“膝盖”，“馒头”，“肥皂”，“现在”，“看”是普通话词汇，而“棒子”，“炕盖”，“馍”，“胰子”，“现而今”，“瞅，撘，瞧”（“瞧”现已收入《新华字典》，因此比词也可算为普通话词汇）则是北方方言词汇。再如，剋 kēi（打或骂），寻（要或借），头（前），今儿（今天），鸡子儿（鸡蛋），伍的（什么的），言语（说），道（路），溜达（散步），赶明儿（以后），别介（别这样），扪（吝啬），打（从），包（手提包），耗子（老鼠），提搂（提），起子（酵母），没辙（没办法），擦黑儿（傍晚），说活（就到）（立刻，马上），周一，周二 etc.（星期一，星期二 etc）则是北京方言词汇。普通话所选择的词汇，一般都是流行较广，而且早就用于书面上的词。3. 语法标准。普通话的定义里“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这是普通话的语法。这个标准包括四个方面的意思：①“典范”就是排除“不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做为语法规范；②“白话文”就是排除文言文；③“现代白话文”就是排除五四以前的早期白话文；④“著作”就是指普通话的书面形式，它是建立在口语基础上的，但又不等于一般的口语，而是经过加工的，提炼的。汉语语法结构，在各方言中大致相同，差别也有，但比语音和词汇的差别要小得多。

各方言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语音上，因此学习普通话的关键在于语音。但是不能只顾语音，而不顾词汇和语法问题。这就是说，形成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必须兼顾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进行长时间的研究与努力。世界各国民族语言规范化成绩最为卓著的是法国，法语的规范化运动是从1635年建立负责法语规范工作的法兰西学院开始的。经过三百多年坚持不懈

的努力，到现代才在法国全境基本上推广了以巴黎语音为标准音的规范的兰西民族共同语，即“法兰西普通话”。

以上，略顾了北京、北京人、北京话、普通话，为的是了解一下在北京这样的地理，历史（特别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北京人讲的具体的交际工具之一——北京话，为的是再进一步认识规范的中华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存在意义。现在要“言归正传”让我继续研究北京话吧。

5. 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差异

初到北京的人也许觉察不出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差异，但常住在北京的人就会感觉北京话和普通话有所不同。

(1)北京话同一个意思只有一种读音，普通话有两种读音：

汉字	北京话	普通话	参考例
阿	ā	ā, ǎ	ā ē 阿Q, 阿居宫(普)
伯	bāi	bó, bǎi	bāibai bo 伯伯(京), 伯父(普)
剥	bāo	bāo, bō	bāoxiāo bōxuē 剥削(京), 剥削(普)
薄	báo	báo, bó	báo 薄片子嘴(京)
臂	bèi	bèi, bì	bei 胳膊(京)
给	gěi	gěi, jǐ	
嚼	jiáo	jiáo, jué	jiáo jiáo jiáo 背后嚼人, 嚼根, 嚼谷(京)
角	jiǎo	jiáo, jué	jiáo 角儿(京)
觉	jiǎo	jiǎo, jué	jiǎo 觉照(京)
落	lào	lào, luò	lǎo luò 落事(京), 落后(普)
勒	lēi	lēi, lè	lei 他平常非常的勒紧(京)
绿	lù	lù, lǜ	lǜ lǜ 绿林, 鸭绿江(普)

迫	pǎi	pǎi, pò	pǎi pǎi pǎi 迫缸子, 迫子, 迫子脸儿 (京)
塞	sāi	sāi, sè	sāi 胡吃海塞 (京)
色	shǎi	shǎi, sè	shǎi shǎi 色毛, 色子块儿 (京)
削	xiāo	xiāo, xuē	
寻	xín	xín, xún	xín 寻拙志 (京)
跃	yào	yào, yuè	
瞄	záo	záo, zuò	záo 瞧他那副瞄巴儿 (京)
着	zháo	zháo, zhuó	zháo zháo zháo 就这么着吧, 着穿, 就着这儿吧 (京)

(2) 北京话读音和普通话读音不同：

汉字	北京话	普通话	参考例
逮	dēi	dǎi	dēi 疯狗逮谁咬谁 (京)
朽	qiǔ	xiǔ	
熟	shóu	shú	shóu 真熟得慌 (京)
学	xiáo	xué	xiáoxian 把这话跟你妈学学 (京)
二	àr	èr	àr àr 他真二百五, 又胡说八道了。二皮脸 (京)

(3) 儿化词

北京话	普通话	参考例
花儿	花	
馅儿	馅	馅儿饼 (京)
盆儿	盆	
玩儿	玩	皇帝玩儿去吧! (京)
事儿	事	这样就完事儿了? (京)
小孩儿	小孩	
小刀儿	小刀	
媳妇儿	媳妇	

干劲儿 干劲

茶几儿 茶几

一点儿 一点

没词儿 没词 这么一将，他就没词儿了（京）

靠边儿 靠边 靠边儿，靠边儿！（京）

普通话是跟书面走的，而书面法很少儿化，即使是北京作家笔下的书面语也比口语儿化少得多。可以就书面语基本上不儿化，因此普通话也基本上不儿化。有趣的是，中央电台的播音员儿化词很少，北京电台的播音员儿化词用得更多。一般，播音员是北京人，可能中央电台的播音员有意把自己的语言向普通话靠拢，北京电台的播音员就很自然地播出“京味”来。

(4)轻声

北京话有轻声。看《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修订本的注音注了轻声，基本和北京话相符，如“老实”lǎo · shi，老师傅 lǎo shī fu，便宜 pián · yi，东西 dōng · xi，意思 yì · si，天气 tiān · qi，妈妈 mā · ma，爸爸 bà · ba，办法 bàn · fa，大方 dà · fang，麻烦 má · fan，妻子 qī · zi，棉花 mián · hua，点心 diǎn · xin，地方 dì · fang，柿子 shì · zi，馒头 mán · tou，谢谢！xièxie 等。

(5)变调

“我姓李 lǐ，名字永宁 yǒng níng，叫李永宁 lí yǒng níng”，你好！ní hǎo！这种语言现象叫变调。就是，音节和音节连续发音时，其中有些音节的声调起一定的变化。变调常常是由后一个音节声调的变。城市人爱美，是因为比乡下人物质上，精神上有所余地，尤其是京都人。继承西安，洛阳，开封的中原文化的金、元、明、清的北京人，特别讲究文化的集中表现的北京话。经过很长很长的岁月，慢慢酿成悦耳的变调。我相信，将来总会有个语言学家从韵音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充分利用科学仪器，可以证明变调现象的必然性。变调可分以下四种：①上声的变调。如，美好（在上声前），姐姐，椅子，讲讲·想起（在轻声前），小老虎，展览馆，永远友好，转眼两载，转眼两载，种马场养有五百匹好母马；首都，北京，统一（在阴平前）。

祖国，海洋，语言（在阳平前）。解放，土地，巩固（在去声前）。尾巴，起来，宝贝（在轻声前）。②去声的变调。如：办事，快速，互助，大会 etc. ③“一”，“不”的变调。一样，一向，不怕，不够，不是，不对（在去声前）。一般，一年，一尺，一斤（变读去声）。想一想，写一写，试一试，说不说，变不来（念轻声）。④七岁，七件，七次，八岁，八件，八次（变阳平）。

(6) 词汇

在语汇方面，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差异也是最明显的，这已上面稍提过。尽管普通话已经吸收了大批北京话的语汇，还是有相当一部分语汇北京话和普通话不同，并且还是—些常用的语汇。这里，我想介绍一个故事，我估计这不是真事，是老百姓编的一篇政治笑话：1972年冬天随同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有个“记者”到处打听那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的下落。北京市民守口如瓶。“记者”只好在街上找个小学生问问，小孩儿只说了一句：“gǎr pǐ”。那个“记者”就马上汇报给中央情报局说：他 gǎr pǐ。“记者”完成了任务，但美国当局却不知他的下落究竟甚么会事。这“gǎr pǐ”就是北京人经常说的“嗝儿屁招凉大海棠”的“嗝儿屁”。语言就是这样，连三岁小孩儿都熟习的当地话的词，外国的有关语言专家往往没法去猜。

(7) 北京话的趋向

从五十年代全面广推普通话以来，北京话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总的趋势是在迅速向普通话靠拢。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大量的外地人来到北京，并且很快在人口比例上超过了本地人。外地人说的是南腔北调的外地话或者不大规范的普通话。北京人为了跟周围众多的外地人进行交际，不得不尽可能放弃北京话里面的土腔土话，改说“普通话”。这样，北京话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语体，一种是在家庭内以及北京人来往时使用的北京土话，或称老北京话。另一种是在机关，单位以及和外地人来往时使用的社交语体，或称新北京话。现在成年人的时间大部分是在机关，单位度过的。久而久之，这些人的老北京话也发生变化，至少在语汇的选择方面。他在家说一些土话，一到机关，单位上班就改用普通话。据最近的中央电台的广播，北京现在外

谈谈北京话

地人已达 250 万多。北京跟着中国经济政策的变化，市区扩大，加上北京人有种传统思想，就是不大愿意从事，交通警、清道夫、售货员、服务员、司机等的工作。自然，这些工种都由外地人充当。这两年，我发现北京市面上的北京话严重失纯，同时也感觉北京人对南腔北调，北腔南调的外地普通话很宽容，这我看：与其说“宽容”，不如说实际问题。由于大量的外地人的存在，北京人在很多场合不得不说“普通话”，这就使北京话逐步向普通话靠拢。年轻一代的北京人从小在托儿所、小学、中学系统地学习普通话，学习书面语言，在社会上使用普通话，结果是，即使父母都是地道的北京人，在家里说的是老北京话，很多比较“土”的话也能听懂，但是他们自己很少说。至于父母一方或双方都不是北京人的新北京人，他们嘴里就很少土腔土话，很可能不少人根本就听不懂老北京话，这些年轻的新北京人说的北京话，特别是在和外地成年人的交往过程中说的话基本就是普通话。语汇方面的变化最为明显。比较“土”的北京话语汇正在迅速消失，而大量的普通话语汇正在北京话中逐步生根，甚而如“买单”、“打的”、“冲车”、“靓”等本来与北京话距离最大的广州话大量渗透到新北京人的语汇里。“新名词儿”的增加使北京话的总体面貌大为改观。

后记

潮州人爱喝“工夫茶”，围着玩具般的小壶，小杯，喜气洋洋，口口声声地喊道：“吃茶！吃茶！”。他们把“茶”似乎发音成英文的“tea”音，我以为这些“老八路”还懂得外文，暗暗佩服。在那火红的年代，我在江西《五七·干校》念了“博士过程”（即，在农村呆了 4 年之久）以后，由北京谪到河南郑州去。看来，我不是个好学生，但对那些潮州老革命的“吃茶！”声和情景记忆犹新。原来，英文的“tea”是从潮州话的“茶”音搬过去的。后来，我再像踢足球似地踢到广州去……。回顾我这前半生，虽说从没享受过人人相争的“篮球”之幸，却有那“塞翁失马”之福。事情总是一分为二，费了那么些年，走了那些地方，经历了那么些事情……，现在自己总结，……是有好处的。特别接触了包括中国活生生的方言在内的各种语言，对我目

前的职业来说，还是有所帮助的。在教学的过程中慢慢明白了以下事实：北京小孩玩的“锤，钉，钢！”（或“猜，猜，猜！”一即一种猜拳），日本人叫“ジャン，ケン，ポン！”，就是“剪，拳，布！”的广州音。日本人念“北京”“香港”为“ペキン”“ホンコン”，是广州音。日语的“湯タンボ”是北京话的“烫婆”来的。“リャンコ”“コチョ，コチョ！”也是从北京话的“两个”“胳膊，胳膊！”来的，等。我这才切切实实地感觉到了，世上的文化互相影响和浸入，这种事实，知道了，目前世界第二个经济大国曾尽力推进过本国语言的规范化（日本人叫，推广“标准语”），欧洲的文化大国法国也经过三百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才推广了以巴黎语音为标准音的规范的法兰西民族共同语。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方言情况复杂的古老国度里推广自己语言的规范事业比其他国家难得多。不过困难再大，也要正视问题，重视这个问题，一步步地搞。法国人努力了三百年，急性子的日本人都搞了一百年。我们才搞了五十来年。我认为今后也要切切实实地搞下去，切勿着急。中国有句老话：欲速则不达。中国话是中国文化的集中表现，中华民族的精神至宝，但中国人不应只满足过去的成绩，把别国的经验当个借鉴，搞好今后自己的伟大而艰巨的事业。这是100年大计。不过，目前中国的研究条件来说，可以说，研究人员的任重而道远。有大量而细致的工作去做。

参考资料：《茶馆》，《骆驼祥子》（老舍），《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现代汉语》
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至编1995年商务印书馆，《北京话语汇》金受申编1965年商务印书馆，《北京方言词典》陈刚编1985年商务印书馆，《北京史话》阎崇年中华书局1982年，《北京话初探》胡明扬商务印书馆1987年。